

书林漫步

高阳其人其作

◎尚司徒

近读郑颖《野翰林:高阳研究》一书,发现其对高阳其人其作有着全面而深入的评析。首先关注其幼年在横桥老家的阅读经验:

在我,觉得最惬意的是,找个四面通风之处,躺在藤椅上看闲书,吃零嘴。闲书值得一记是《红杂志》《红玫瑰》《礼拜六》,此中作家,后来被封为“鸳鸯蝴蝶派”。这些杂志的出生年份与我差不多,到我能看懂时,他们都已夭折;看的是我早逝的二哥留下来的旧杂志。

在与桂文亚的访谈中,高阳则提及除了阅读报章和聆听掌故外,也饱览中外文学名著。旧小说中《儿女英雄传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都为他所喜爱,西洋文学作品则偏爱欧·亨利的短篇小说;至于写作技巧,自认颇受张恨水的影响。

高阳作品具备一般通俗读物较为欠缺的“专业性”,这特点彰显其作品的文学感染力与历史考据深度。然而郑颖深觉人们口中的历史小说大师高阳充满了矛盾:

首先,他的连载小说是缔造报纸销量的镀金招牌,然而,私底下,高阳总为不被学院认可而愤愤不平,晚年甚至自封“野翰林”,大有生不逢时、我自封我官的意味。其二,作为当代稿酬最丰的作家之一,他却是一辈子喊穷,他笔下的世界满是古色古香,真实的高阳却极爱现代科技,相机、摄影机、电脑,他从未失去流行。其三,高阳的知识系谱来自世家家学,然而,他独具的考据癖却使得他以历史的侦探自居,他的以考据入历史小说的创作观也成就了他历史小说的宗师地位。其四,高阳的朋友众多,其中大多数人以借他高利贷为乐。当王惕吾为他还完钱债后,还得将这些朋友聚拢来,请他们莫再借钱给高阳;然而,真是倾心相交的朋友也能为了他,房子一次又一次地遭查封。他爱极了朋友聚会,但聚会中却常是一人独饮,不发一言。其五,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名士派,丰富的作品一篇一篇靠着连载小说编辑催稿而完成;他是一个不善理财的艺术家,却碰上王惕吾这个供养者,不仅提供丰厚的稿酬,亦提供住所,目的是让他别无牵挂、专心创作。其六,高阳表示,自己是新理性主义的信徒,而所谓新理性是指人性与科学精神的结合。但是,他的历史小说中处处可见“子平之术”、命相、占卜;他对《红楼梦》的创见即是由平郡王福彭的八字验证元春为福彭考。其七,高阳作品中的主人翁多有齐人之福,从胡雪岩到龚自珍,哪一个不是处处有艳遇。然而,他本人的婚姻仅维持十年,晚年的红粉知己是擅长烹煮“烤麸”结缘。生命中最后一个新年,高阳是独自一人在饭店度过,其实落寞孤寂。

这段堪称本书文眼。

书边杂写

“知堂收藏越人著作”

◎曹随

谢冬荣编《知堂古籍藏书题记》收录国家图书馆藏周作人旧藏古籍的题记120条,所有释文均相当精准,这固然是因为周作人的题记写得疏朗工整、横捺均有规矩、识读较为容易,然而未必就与编者的严谨与审慎无些许的直接关系。当然,如果硬要吹毛求疵,释文也还有一两处微误有待校正,例如《睫巢后集》题记,“前得《睫巢集》二册,有叶焕彬藏印,乾隆六年刻本。刻者洪东阁,即陔华子。书颇精致,与人讲殊相似。此《后集》则五年后杜补堂所刻,板式同而工不逮前,又是后印,用白纸,故不能与前者配合也”。其中“与人讲殊相似”不辞,复核题记图版,“人讲”原作“人谱”,即明儒刘宗周所撰哲学名著。

因刘宗周是绍兴产,乃周作人的乡先辈,而周作人着意购藏历代乡人著述,并且刻有一枚“知堂收藏越人著作”的藏书印,所以《人谱》是苦雨斋不可缺的插架之物。不过,《人谱》版本繁杂,周作人所藏系雍正四年洪正治教忠堂刻本。此本乃据乾隆十七年傅雷鋐与郑肇奎在证人堂所刊《刘戴山先生集》翻刻,据洪正治自序,“比从友人处获读戴山先生证人堂《人谱》,因钁之家塾,并以公诸同志。据傅氏本稍有增益,且谓《类记》亦先生手自甄录者,今悉仍之”,是以包括《人谱》一卷、《人谱类记》两卷,分为上、下两册。此洪正治即洪陔华,也曾刻过《白石诗词》,在周作人看来,《白石诗词》却不免乎“苟且”,远比不上“洪氏刊有证人堂《人谱》二册,甚精好”。

《人谱》钐有“知堂收藏越人著作”“苦雨斋藏书印”等朱文印,另有“从好斋藏书记”白文印、“从好斋珍藏”连珠印,则此前似乎是清人徐允临的旧藏。1947年,周作人被判刑之后,其藏书由当局收缴,交北平图书馆存放,因而《人谱》又有“北平图书馆藏”朱文印。其余“子孙保之”“古训是式”“学于古训乃有获”诸印,不知谁属。

《青蛙王子》

插图选(3)

查尔斯·福卡德 绘

青蛙喊道:“公主,带上我一起走,请遵守你的诺言。”但公主装作没听见。



新书快递

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

陈越光 著
东方出版中心

本书介绍了中国文化书院在20世纪80年代“文化热”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以及所经历的内部分裂和动荡。对于如何分析当时“文化热”的形成和走向、如何看待当时民间文化团体与社会改革等问题,作者提出了独到看法。

中国的十个名字

郑子宁 著
海峡书局

本书探索了不同文明对中国的多样称呼,细致剖析了这些称呼背后的深厚意蕴与演变轨迹。作者揭示了语言作为文化交流桥梁在传播中的普遍规律,不仅呈现了一场关于中国别称的文化知识盛宴,更提供了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生动例证。



跟着玄奘走丝路

党琳 著 张安福 主编
岭南古籍出版社

全书依托作者多年对玄奘西行路上榆林窟、塔尔寺、高昌故城、克孜尔石窟等历史遗迹的实地考察,结合玄奘远赴印度取经的故事及历史背景,并以百余幅实景图深度打卡、解锁玄奘之路的古与今,呈现丝路上的文明互鉴,感悟玄奘信念的力量。

末世举人刘大鹏

行龙 著
三晋出版社

全书围绕清末、民国时期山西太原县乡绅刘大鹏及其《退想斋日记》,勾勒出刘大鹏个体生命史的同时,围绕个体生命与地方社会的互动,关注大时代里的“小人物”,对处于大变局时代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实现了“解剖麻雀式”的深入研究。

钱锺书与周作人有过通信

◎桑农

翻阅新版《周作人日记》,1932年11月17日有记:“受信:平伯、巨渊、肇洛、钱锺书。”同月29日有记:“发信:尤平白、钱锺书、天行、玉英堂片。”年轻的钱锺书给周作人写过信,并得到回复。这两封信应该都已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了,信里写了些什么呢?

回顾特定的时间节点可知,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《新月》第四卷第四期刊载了一篇关于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的书评,署名“中书君”。

钱锺书写信给周作人显然与此事有关。从日记中可见,周作人给人回信一般都很及时,有的当天就回复了。这一次拖了十几天,或许是因为他要找到杂志看后再表态。

周作人的回信是找不到了,但他对钱锺书书评的回应在其后来文章中有迹可循。例如,写于1935年8月24日的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一集〉导言》以及写于1937年6月1日的《自己所能做的》里关于言志派和载道派

内涵的补充说明,还有写于1936年4月30日的《〈梅花草堂笔谈〉等》里关于张大复文学史地位的评价。

对读钱锺书的书评和周作人的文章,发现两人文学批评观念的差异和分歧十分明显。不过,我还是很好奇他们之间往来书信的具体内容,尤其是文字表述。公开辩论和私下交流肯定会有不同的语气和态度。两位都是尺牍高手,如何切磋过招,一定异常精彩。

书评书话